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第4辑

*Marxism
and China*

013029460

D61-53

25

V4



*Marxism
and China*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第4辑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D61-53
25
V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4辑/岳川夫,沈济时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 - 7 - 208 - 11148 - 6

I. ①马… II. ①岳… ②沈…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发展—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D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036 号

责任编辑 黄玉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4辑)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308,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148 - 6/A · 93

定价 42.00 元

序 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4辑),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教师及部分研究生撰写的论文结集而成,包括“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海外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等五个板块。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时间不长,目前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老师除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外,还涵盖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多元的学科背景在碰撞中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哲学是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的哲学学科团队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团队。他们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他们的研究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还涉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在本论文集中,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政治理论部原主任岳川夫教授的论文《理念理性、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李宏昀博士的论文《治国之象与平天下之象——读〈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札记》值得读者关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一个研究方向。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我校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点。近年来,我们通过人才引进和内部挖潜,使该学科得以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在本论文集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行学术史梳理的论文,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历程和理论成果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进行学科学术研究,还要从事教学研究,要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对象、手段和方法等进行研究。通过教学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因此,我校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的教师除了思想理论教育学科的教师以外,几乎政治理论部全体教师都在进

行相关研究。编入本论文集的 11 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涉及了我们对“讨论式”教学的思考、对大学生“领导力”的培育、对大学生各种心理问题的探讨。

“海外中国研究”是政治理论部教师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海外各种势力对中国越来越关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报道等逐渐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对象。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已有多位教师从事“海外中国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学科团队。因此,我们也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到了本论文集。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是实现思政理论课教学“贴近实际”的主要抓手,思政理论课教师不了解中国实际、不了解中国国情是无法上好“思政课”,无法成为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编入本论文集中的 3 篇文章,是教师们在研究当代中国,了解和把握中国实际方面的尝试。

“思政课”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教学任务更重,参与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更多,被赋予的各种责任也更大。他们在完成各种教学任务的同时,也在利用难得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思政理论课教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繁荣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

岳川夫 沈济时

2012 年 11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序言 / 001

哲学研究

- 岳川夫:理念理性、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 / 003
陈庆权:“哲学”一词的当代解读 / 017
李宏昀:治国之象与平天下之象——读《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札记 / 024
何 臣: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 / 030
王 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现代性批判 / 037
杨人懿:历史终结论的维谷——基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分析 / 04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

- 花 勇: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 / 053
喻包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践路径研究 / 063
赵庆寺:试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统筹发展 / 074
沈济时:试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关系 / 085
王建龙:和谐的道德传统和现代转化——论严复“治道”理想中的道德意蕴 / 092
张建忠:也谈“公民社会”概念的使用问题 / 102
刘颖涟:冷战演进下中间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反应 / 110
陈 莹: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 / 120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胡克培 冯晓淑:政治理论课案例式讨论 / 129
张 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嘉宾”讨论式教学模式初探 /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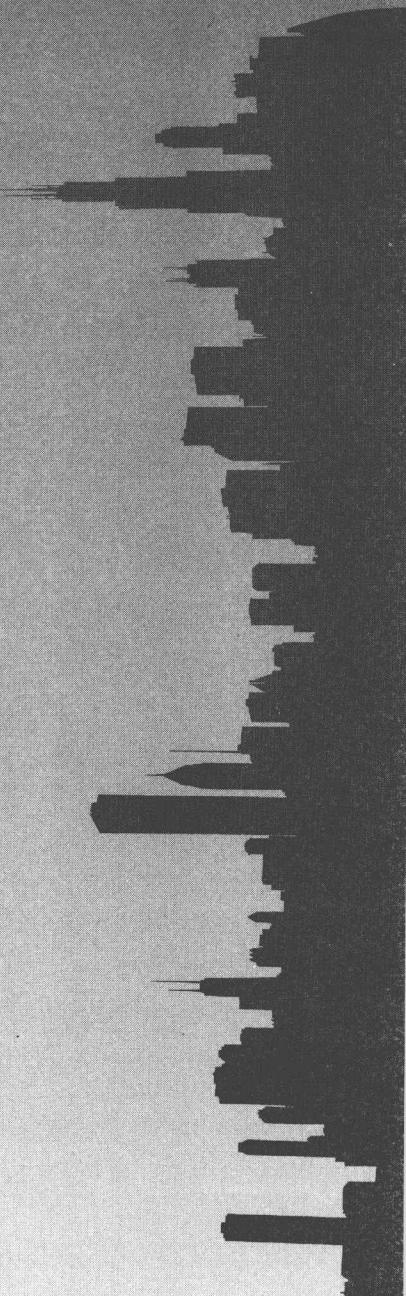
- 周嘉楠:试析讨论式教学在“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的价值与实现路径 / 150
 胡志平:经济学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探析 / 158
 李洁:关注大学生特殊群体——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 / 170
 马川: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大学生领导力培养 / 179
 万勇华:道家思想观照下的大学生心理保健方式探究 / 188
 孙燕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探讨 / 198
 罗昭升:从学生的心理现状来反思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 / 207
 吴倩倩: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214
 张语潇:政务微博——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载体 / 221

海外中国研究

- 党为:海外学者眼里的“五四”——从《闺塾师》绪言到一本旧译文选的札记 / 233
 刘招成:美国对中国法律政治的研究简述 / 245
 董洪楠:外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与建构——以《联合早报》为例 / 261

当代中国研究

- 陈代波:网络暴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 271
 李波 李晴:在当前稳增长背景下对中国股份合作公司现状及其发展的思考 / 281
 陈鹏:为民营经济拓宽发展空间——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所在 / 291
 后记 / 299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哲学研究

理念理性、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

岳川夫

在人类思维与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三者始终是中外哲学家及学者长期思考、研究、探索的文化理论问题。笔者单就人类在理性精神、理性认识、理性思维等哲学方面的探索与发展作一些梳理,并就中外文化思维方法上的差异谈一些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

所谓理性精神是一种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文化,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思维与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它是相对于人们的感性认识而言的。人们的一切认识、知识都来自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而客观事物有现象与本质,事物的外在联系,表面特征与事物的内在联系之分。凡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直接获得的对于事物的现象、外在联系和表面特征的认识,我们一般把这种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和直接性特点的认识,称为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感觉、知觉、表象三种形式。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这种认识叫作经验或者感受。当然我们的一切认识、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直接的感性材料,它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一切认识与知识离开了感性认识,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感性认识是人们认识的起点,它在人们认识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人们的认识过程来看,人们对事物认识任务的实现与目标追求,又不会停留在感觉、经验上,必然要去获得理性认识,去追求科学与真理。

所谓理性认识,是指人们在占有大量丰富的、具体的、直接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用抽象思维方法获得的对于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规律的认识。它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出现。虽然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它在与事物的

关系的表面上,有抽象性、间接性的特点,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感到理性认识太思辨,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显得很空洞,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而事实上理性认识、科学理论是人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它比起感性认识,能更深刻地、更正确地、更完整地反映现实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西方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极力推崇理性,他认为感性认识是不全面的、不可靠的,人们的感觉会欺骗你,因为感性认识没有必然性,而理性认识是全面的、可靠的,它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把理性作为一种精神客体,称为“绝对精神”,他把“绝对精神”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提出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人们认识与把握“绝对精神”不是直观的、抽象的,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由肤浅到深刻、由不真实到真实、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认识首先必须从最低级的感性认识开始,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自我运动”过程,使认识不断地提高,最后才能逐步揭示“绝对精神”的内在本质,获得理性认识,达到把握对立面统一的“绝对精神”。

黑格尔在认识上区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同时,作为“概念辩证法”的大师,又把理性认识分为“知性”与“理性”,或者称之为“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在黑格尔看来,感性认识是对现成事物的直接性的认识。在这个认识阶段里,人们思维所把握的只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思维只能有一个混沌的感觉现象,这种认识是初步的、低级的;而要获得真正的高级的认识,认识活动必须要进一步发展,要对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单独的认识,人们的思维要进入推论的阶段,即间接性的认识,这就是“知性”认识的阶段。“知性”认识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律进行推论活动。他认为,“知性”认识到“绝对精神”的内容并揭示出它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彼此对立的。“知性”只是“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①知性认识是把每一个有限的概念当作彼此隔离的、互不联系的,知性认识是一种抽象的、分离的观点。它把概念的内在本质看成是在自身之外,与自己绝对对立,不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概念与实在是不可分离的。黑格尔在这里从辩证思维方法出发,看到了“知性认识”的缺陷。他指责哲学上的诡辩论孤立片面地对待事物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2页。

的方法。黑格尔这些机智的观点,使笔者想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在认识与处理生活及工作事务中,往往主观地、独断地把“知性认识”当作“理性认识”,用这种片面的“知性认识”去下结论,从而造成日常生活与社会工作的失误,包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把“知性认识”当作“理性认识”去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造成重大的工作失误,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宣传界著名的老前辈周扬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醒与要求我们理论界的同仁,要特别重视对黑格尔提出的“知性认识”的研究,提醒我们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一点哲学,要用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负责态度去认真学习理论,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与事业上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用科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周扬同志的文章与其中所给予的提醒,现在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正因为黑格尔是把认识看成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他在指出“知性认识”的缺陷时,也肯定了“知性认识”在认识链条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知性认识”使我们对每个概念能加以明确区别,给予准确的把握,还是有其作用的,“知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理性思维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知性认识”只是一种有限的认识,人类的思维要在有限中去追求无限的东西,思维不会一直停滞在“知性认识”阶段,人类思维必须继续发展。黑格尔认为当“知性认识”发挥到顶点时,必须要扬弃这种认识的有限性而转化到它的反面,去认识概念的内在本质,人们的思维要不断地扬弃自我并过渡、转化到自己的反面,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获得真理,达到“科学认识”。

二

人类为了生存,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大脑自身的进化,摆脱了过去仅仅用感官认识事物的习惯,慢慢地形成思维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抽象的能力,能从个别的、个性的、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上升到对这一类事物的一般的、共性的、抽象的、普遍存在的思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理性思维,逻辑的方法,认识事物的内在的本质及其规律。

纵观中外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充分地看到人类这种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与变化。讲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发展,当然离不开古希腊罗马时

期哲学家对理性思维力与逻辑推理方法的贡献。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方面考察,德谟克利特作为一个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超越了泰勒斯等人把“水”、“火”等自然物体作为世界本原的观点,提出了“原子”的抽象概念。“原子”这一物质存在,人是看不见的,但它确确实实又是世界的根基,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以至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原子论”,奠定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唯物主义的“原子论”的基础。古希腊的另外一位哲人赫拉克利特,在提出“火”是一切事物本原的前提下,认为火是变化的,火通过空气浓厚起来变成水,水凝结又变成土,火—水—土之间不断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的相互转化,这种规律,赫拉克利特称为“逻各斯”,而“逻各斯”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人们对它毫无所知,它仍然存在着。而且,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万物都遵循这个“逻各斯”,它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支配人的主观世界。赫拉克利特还认为,“逻各斯”是可以认识的,但多数人不能认识它,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它,因为“逻各斯”不能凭人的感官感知,而是要通过人的抽象思维,即理性才能认识它。他还认为即使一个人知识面很广,非常博学,但是博学并不能使人有智慧,因为智慧不在于只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认识“逻各斯”。

我们在谈论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对“理性”的探索时,不能不提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两位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把一切知识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来自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他认为知识与工匠的技艺不同,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而只有认识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东西,才是有价值,才是真正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自己是无知的。在这里,苏格拉底已经提出了一种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应停留在个别、具体的东西上,而要提高到一般、普遍,提高到理性认识。由于苏格拉底其时还未能辩证地说明个别、具体与一般、普遍的关系,还不能科学地解答人们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因而苏格拉底把理性思维加以神秘化了。而且,苏格拉底把一般、普遍、共性的东西仅限于道德、伦理领域。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老师的理性思维的探索进行了进一步的展开。首先,他认为苏格拉底所讲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概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

这种存在并不像老师所说的那样仅限于道德领域,概念也并不仅仅是思想的范畴,仅仅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柏拉图认为,这种概念是独立于事物和人心之外的存在。柏拉图把这种一般概念称为“理念”,所有的理念构成了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的世界,即理念世界,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至于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其次,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是确实可靠的,是真实的,不容许有矛盾、有错误。而且这种知识也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我们获得知识的对象也应该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存在。根据这个标准,柏拉图提出,人们的感性知觉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感性知觉是相对的、易变的、不真实的,而只有认识到“理念世界”,这种认识才是真正知识,是理性知识。再次,柏拉图在论述理念与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时,认为理念是个别事物的基础,理念是原型,个别事物上是“摹仿”原型产生的,比如对“美”来说,个别事物的“美”是不可靠、不真实的,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看法,它处在可变、不确定之中,而只有普遍的、永恒的“美”的“理念”才是可靠的,它是永恒不变的,才是“真正的实在”。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柏拉图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要求人们从具体事物,从许多个别事物中去寻求一般、共性的东西,不要把认识停留在个别具体事物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些观点从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来说是一大进步,因为科学、哲学是需要探求事物的一般、共性、普遍的本质与规律。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人类理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也为西方哲学文化中的理性思维、理性认识、理性精神的思想文化传统与逻辑思维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哲学基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人提出了普遍概念,强调逻辑思维方法,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他们还形成一种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哲学文化与精神,苏格拉底被当时的民主派政权判处死刑后,他的学生要救他出狱但被他拒绝,他要为他的信念献身,公元前399年他在狱中饮鸩而死。西方学术界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及其人格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当然不可否认,他们这种把共性、一般和“理念”加以绝对化、神圣化,使它可以离开个性、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割裂了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把“理念”作为一切事物的“原型”、“范本”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也给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延续的理性主义思潮留下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从人类理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方面思考,古希腊罗马

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观点与思想显然是处在“理念理性”阶段。

三

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对人们理性思维的探索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为西方社会的哲学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大部分哲学家在论述理性时，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把“灵魂”不死作为精神客体，并凌驾于一切物体之上，即使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概念，由于自然科学的限制，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而仅仅是一种猜测，这就决定古希腊罗马哲学后来的衰落，这种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于与神学结合一起，逐步为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所替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就极力贬低理性，认为理性不能同信仰的真理发生矛盾，理性必须从属于信仰。科学要为宗教服务，把理性和科学限制在尽可能低级的地位和狭小的地盘里。而且，这些神学家们还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中的演绎的推理方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

西方到了近代社会，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与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需要政治地位，在文化上要从神学中恢复人的地位，提出人权，大力提倡人文精神，反对神权与王权。到16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掀起，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哲学认识论上推崇人的感觉经验。思维方法上，宣扬归纳法、实验方法，强调一切知识必须实证，被实验证明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论者休谟从感觉经验出发，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休谟反对基督教一向采用“神迹”来论证上帝存在的作法。他认为这种作法简直是蠢不可及。他写道：“任何神迹的证据从来连‘可然性’的地步也达不到，至于证明的地步，那更是达不到的。”这是因为，基督教所说的“神迹”从来不能为人类的经验所证明。^①

西方哲学发展到17、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逐步进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崇尚理性的转型。法国启蒙思想家培

^①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2页。

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狄亚克以及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哈等人，他们从人文精神出发，认为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人的本质，并把理性作为一种工具，作为衡量社会中的一切是非、善恶、美丑的根本尺度，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念理性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提出的“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批判，或者说，理性作为一种批判武器，主要体现在批判社会宗教与封建专制制度两个方面。

其一，批判社会宗教，提出“宗教是理性的大敌”的口号。培尔是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先驱。他首先怀疑上帝的存在，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对立的，而历来的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都力图用理性的力量来证明宗教教条的真理性，论证上帝存在的真实性，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用理性的方法是不能证明宗教信仰的真理性的，理性却能揭露宗教的荒谬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尖锐地抨击作为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教会的罪恶行径。他指出，人生下来时根本没有神的观念，小孩没有神的观念，非洲一些民族也没有神的观念。天主教所谓的“神”完全是僧侣的欺骗和人们无知的结果。他还指出，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残暴的血腥史。据他的统计，人类因基督教而丧失了一千七百余万生灵，也就是说，每一世纪就有 100 万人被处死刑。孟德斯鸠也极力抨击天主教教会，他讽刺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教皇是魔法师，因为教皇可以使国王相信三等于一（指天主教的教条“三位一体”）。他还谴责天主教会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会掌握了大量的钱财，可是教会永远只会往里拿，决不向外掏，财富落入教会的手中，只能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既没有贸易，也没有质量，当然也就不会有创造，万般停滞不前，死气沉沉。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更彻底。狄德罗就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最后根源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所以“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①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是假的，如果宗教是真的，那么应该在一切地方、一切时间，使一切人都感到兴趣，可是任何宗教都没有这三种性质——永恒性（一切时间）、普遍性（一切地方）和明显性（使一切人都感到兴趣），所以“一切宗教都三倍地被证

^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6 页。

明是假的”。^①狄德罗认为，宗教迷信是起源于无知和恐惧。由于人们无知，不能理解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后果，因而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并把这一切归之于超自然的力量——神。因此，他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人类的理性一定能克服迷信，科学能消灭宗教。而无神论者霍尔巴哈在批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宗教教条，分析宗教产生人类的无知与恐惧的同时，揭露宗教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的罪行，他说：“宗教——这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②

除了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用理性批判宗教，此外，法国的理性主义、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在怀疑论原则下，在追求各种知识的真实性和真理性的前提下，提出对一切存在都应该分别把它们“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然后对那些合乎理性的原理或观念再加以吸收。笛卡尔同时也用“理性”的权威反对盲从和迷信，对于宗教领域中的东西也表示怀疑，这无疑是对宗教神学的一种打击，这种哲学的进步性是明显的。

其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法国资产阶级掀起的启蒙运动和倡导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潮，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救运动。法国思想哲学家高举“理性”旗帜，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在对社会中存在的宗教进行批判的同时，还用“理性”对社会形式、国家制度进行最无情的批判。孟德斯鸠作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与大法学家，用理性和现代法学思想竭力反对“朕即国家”的君主独裁。他认为，在封建专制国家里，法律等于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君主的决定一旦发出，便应立即发生效力，即使君主是在酒醉或是精神失常时作出来的决定也定要执行。君主“反复无常的意欲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意欲”^③。思想家卢梭从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观点出发，反对封建专制，提出了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卢梭还认为，契约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缔结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由于每个人都向全体奉献自己，所以每个人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因此，人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权利。这样，人们虽然丧失了自然的平等和自由，但可以获

^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8页。

^② 霍尔巴哈：《健全的思想》，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17页。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页。

